

移民、返鄉 與傳統祭典

—北臺灣都市阿美族

原住民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

謝世忠·劉瑞超 著

出版單位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移民、返鄉 與傳統祭典

—北臺灣都市阿美族

原住民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

謝世忠・劉瑞超 著

出版單位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本會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為拓展有關臺灣原住民族各項學術研究合作關係，於92年11月17日共同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以整合政府機關間行政資源方式，並以「臺灣原住民族史專題計畫」為基礎，合作辦理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歷史及學術等相關研究計畫。

前述專題計畫範圍係將臺灣原住民各族群依系列主題訂定專題研究範圍，並分年執行，專題研究項目計有「臺灣原住民族與考古遺址關係調查」等7大項，本次完成之「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乙書，即屬其中「原住民族傳統祭典研究」專題。

本書所謂原住民族的「移民」，實際指的是臺灣地區原住民族自原鄉部落，移居至都市的現象，因移民而產生之行政管理（居住、就業、教育、福利）、文化維繫、族群階級、語言教育等問題，向為政府機關及學術單位長期關注且致力解決的議題，此一議題於學術層面包含了人類學、社會學及語言學等多方面，本書主要係由人類學的角度切入，以文化議題為主軸，針對原住民族中人口最多的「阿美族」進行研究，並就阿美族文化中最顯性，同時也最為一般民眾熟知之

「豐年祭」為探討對象，於特定範疇（族群、文化特性）、對文化存續或形質轉變進行深度及廣度兼具之研究。

「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一書付梓，詳實紀錄阿美族人豐年祭期間，在都市地區參與現況及返鄉參加部落傳統豐年祭情形，探索參與過程和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研究成果可形成一典例，以為往後其他族群類似議題提供啟發之素材。

主任委員

夷將·拔路兒
Icyang Parod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祭儀，是臺灣原住民族重要的文化意涵，其形式與音樂反映社會構成的原則與特色，不但延續文化的生命禮俗，也展現了個別化的藝術面貌。一般人輒以熱鬧的慶典歌舞來看待它；實際上原住民祭儀種類很多，隨著族群的不同，而蘊含不同的意義。傳統祭儀的舉行常在依山傍水的環境裡，以天地為舞台，以夜幕為背景，那是敬拜神明、崇敬祖先的部落倫理與社會生活實踐的重要環節。

臺灣原住民的都市集中遷移是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顯著的現象，族人除了不斷在適應新型態的生活，其帶自家鄉的「文化傳統」，亦從未間斷地在生活角落中綿延，祭儀仍然是各族群最重要的文化資產。

原住民遷至都市後，這些新都會住民亦常在自我族群的歲時祭儀日舉辦活動，以期對部落生活記憶具象化，並藉此延續文化的命脈及對原鄉的向心力。近年來，更多的族人在重要祭典時刻返鄉參與，形成了祭儀期間人口短暫回流的特殊現象。而都市因聚集了不同族群，生活相互照應，活動也相互支援，甚至也融入當地社會，對於傳統祭儀難免發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甚至原鄉祭儀也因之轉化，值得重視與探究。

本館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執行的「臺灣原住民史專題計畫」中的「原住民傳統祭儀」主題，其目標之一，即是希望將現代化衝擊之下的原住民傳統祭儀，如何因應與調適，並展現其精髓，而不失其神聖意涵。這些地域性的差異，亟須作一比較分析，及時加以記錄，俾使後人理解其轉變之原委，本書即是此項研究的重要成果。

本書研究團隊，即基於上述的理解，擇定以阿美族為對象，探討議題甚廣，主要包括：移居都市的原住民群體，如何重現傳統祭儀？政府部門如何與移民群體在祭典呈現的活動上進行合作。返鄉參與部落活動，是否會影響在都會區已行之經年的祭儀再現？返鄉參與的祭儀內涵與在都會區展演的內容是否相同？遷居都市的族人如何面對變遷，以及如何詮釋「傳統」記憶與當下現象的關係。

本案以北臺灣阿美族原住民所舉辦的豐年祭為例，就不同行政區域範圍分別進行田野調查，歸納族人參與該項祭典的情形。再者，觀察都會族人與原鄉部落間的連繫景況，分析出回鄉參加活動密度與旅居地間之關聯。阿美族豐年祭儀參與的研究，一方面能充分瞭解傳統祭典在當下存在、展現、或質變的景況，另一方面也對族群文化認同作用產生理解。

謝世忠教授長久的研究耕耘，成果豐碩，提携後進，亦不遺餘力。年輕學者劉瑞超君隨同謝教授深入北臺灣的雙溪、平溪、坪林等，並多次往返花東的瑞穗、長濱、東河等地調查，及擔綱撰稿工

作，能力頗獲肯定。此外，祭儀的舉辦，有其時間性，全面進行觀察殊屬不易！這些成果，即將完整展現，先讀為快，並綴數語為序。

館長 謝嘉梁

2007/12/5



執行一個學術研究計畫，常常出自偶然，但，其中的緣分巧遇妙趣，卻也直接促動了工作於計畫的研究者，絲毫不敢怠懈。二十數年前，筆者正值準碩士青年，多次與「美女良伴」逗留花東阿美部落，記憶中，至少打擾過南華、壽豐、馬太鞍、港口、豐濱、馬蘭及德其里等社區。對於各地方，我們大致均留下了「寧靜悠揚」的印象。即使值豐年祭日子，在今日已成熱鬧滾滾之地的港口部落，當時亦僅見族人團圓輕舞，沒有急切入影的攝像機制，找不到觀光人聲，也絕無文化使命在身的各類學問人。族人和我們的對話，就是微笑與招手。那是八〇年代初的東臺灣，筆者甘耐念之。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往，大約就是「寧靜悠揚」時代的出生兒，已至「而立」年頭。今日阿美已大不同於前。港口豐年持續，樣態多彩，「微笑與招手」被文化規範的「真實」展演所取代。或者說，外來客蜂擁，跳過靜處四周可能的微笑與招手，人人爭睹節慶「傳統」步驟，以證歷史，以全文化。

2005年臺灣文獻館希望有人研究原住民族傳統祭儀，筆者觀乎身邊，人力充足，回想少年那時，情分澎湃，於是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

學碩士劉瑞超先生（現為人類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共提計畫，準備好好地田野原鄉田野都會，記下阿美豐年祭花東北臺灣，繼而進階討論其間族人往返加持，或在地承續與創造的過程。

計畫上路，才知困難。七月至八月，「從臺東一直跳到花蓮」是為當今族人敘述豐年祭景況常見的用語。然後，九月到十月，都會各區繼續跳。換句話說，要詳細記錄豐年祭，四個月內必須跑遍遍。筆者組織了一個將近10人的大團隊，2005和2006兩年的夏秋季節，先是分駐各點，再串聯流動，務求親臨現場，大小都要。「大」的群落，經典名氣，成千成百人匯聚，浸染文化「真實性」。「小」的村舍，幾十人甚至十幾人也樂，同樣在慶豐年。北臺都會龐大，族人散處遼闊，所以，各區獨立舉辦，而我們也盡力參與。終於，資料彙進，統合書寫，完成了本書。

教授帶著研究生執行計畫，是大學研究工作常態。筆者的作法是，第一次上陣的學生助理，當以收集資料為主，而計畫書、報告書或論文，理當由老師自己操刀。有了資料處理經驗之後，再次計畫參與，就應訓練年輕助理共同執筆寫作。順利成功了，接續的計畫，如果同班師生人馬仍是合作，或許連計畫書的初始構想，均應請為生晚輩設法展現創意，為師就在旁輔助。如此，一名具獨立研究能力的學者，方可於系統經驗中養成。

本書阿美豐年祭初始構想由筆者而來，但瑞超的一句「都市原住民」，提醒了研究範圍必須跨越原鄉異鄉。畢竟，阿美有近半人口在

都會，而新居地又處處見到豐年節慶活動，若未能納入他們，則任何阿美研究都是缺憾。田野派駐助理全是臺大的學生，她（他）們是人類學系的黃郁倫、蔡馨儀、張育綺、楊舒帆、賴冠蓉、葉煜培、李育英、林嘉運，歷史學系的李東亮，政治學系的李湘婷。瑞超是同學們的總將官。兩年的時間中，最常聽聞者，就是山間海邊的駐點少女少年，手機扣來呼求瑞超學長指點田野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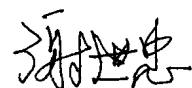
筆者除了也有分配區域之外，亦常和瑞超一起突襲現場，鼓勵同學，感謝族人長輩舊新好友的包容與指導。

田野助理大群人馬如上名單。不過，直接間接協助我們，或哈哈笑謝老師體重不凡仍在跑田野者，還有楊鈴慧、楊政賢、陳彥亘、郭倩婷、吳宜霖、郭欣諭、姜以琳等也是學生好友。其中鈴慧貢獻尤多，勞苦功高。筆者比她（他）們年長多多，卻深感能與此少女少年人類學稚氣班隊共事，即使自己氣質犧牲，變得也是「稚」，仍為畢生最大榮幸之一。感謝大家！

全書九章，筆者與瑞超言好，大致原鄉他寫，異鄉我來。其它不分故鄉他鄉者，也是我的任務。所以，第一、二、三、六的一半，七、八、九筆者主筆，四和五超大份量者以及六的另一半，瑞超負責。章節量我勝，字數則他贏。初稿草成後，筆者再從頭潤飾，求其語氣一致。

2007年的當下與二十數年前的「記得當時年紀小」時空交織，完筆序言之際，突然小小驚覺當年的「美女良伴」，依是以美女之姿良

伴筆者。她是妻子。回憶情事與古典照片，多受惠於她。港口往日悠悠今日濃烈，北臺融入阿美，都會增光。豐年節慶常續，我們不止見證，更是期待。期待又一「二十數年」之後，阿美的「寧靜悠揚」有所再現，引領大家看得到「微笑與招手」，繼而細細品味文化的生命力。



序於臺北芝山岩
2007/12/2



作者二

這是筆者第二次參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委託研究計畫，上一回是2004年台三線客家地區的文化產業調查，跟隨新竹團隊的計畫主持人謝世忠教授在山明水秀的八個沿山鄉鎮中四處走訪，瞭解北部客家鄉親在土地上努力生活的故事。2005年承蒙謝世忠教授不予棄嫌的邀請，於是再有機會參與文獻館的原住民研究計畫。兩年多來，筆者與主持人和研究團隊的許多位同學，在北臺各鄉鎮及花東兩縣各阿美族部落四處奔波，看見了各式各樣的豐年祭文化，也看見族人在不同生存環境中對於傳統的堅持與當代的創意。那份堅持，不必然是對於「傳統」文化，更是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同。我們駕車奔波於蘇花公路及縱谷海岸間，或站或坐在臺鐵東部幹線中，倒也頗能體會族人離鄉老遠再辛苦返鄉心情之一、二。

如同許多阿美人一樣，在筆者的生命經驗中，「移動」的次數也相當多。甚至沒有一個永久固定的家，離家漂泊久了，也思索在新居地安身立命開展事業，但卻也不會與還在漂泊中的老家斷裂失聯。「家」是一種意象，無論在哪裡，我們總有個家，也才能返鄉。老家會變，會搬遷，會改建。回到故鄉，固有的情感總是依舊，過往生命

記憶引領我們返家，找回過去的自我，瞭解現在的自己。為了生存，移動是人類的天性。離家是個不算小的決定，世居花東的阿美人，在他鄉異鄉的移動之間所呈現的文化現象，更能呈現出原住民族在臺灣社會所處的位置。來到都市大社會，個人特性可能被抹去，族群特質或許被掩埋，似乎失了文化之根。但我們確也發現，文化之根會在某處以另一種形式存留，發出新芽。或許，這不是阿美人獨有的現象，也不是原住民特有的遭遇，而是你我都曾面臨，只是形式不同，然，阿美族人讓我們看見了堅韌的族群文化生命力。

兩年多來，受到許多阿美族朋友長輩的教導與協助，讓我們有機會認識到當代阿美族的生活，也才能讓本計畫順利進行。研究團隊中的幾位主要戰將：小米（郁倫）、馨儀、舒帆、育綺等，均是本計畫的大功臣。臺東池上米王子小潘（Cunuk）更是花東田野的119大隊，透過他各部落友人的調兵遣將，解救迷途失溫飢餓又無處落腳的我們，同時三不五時發放池上米救濟大家。文獻館的美惠小姐，電話催繳報告聲繞樑不絕於耳，更使筆者永遠處於備戰狀態中不敢懈怠。此外，彥亘的督促及鼓勵，政賢的各類協助，在此都一併感謝。謝世忠教授引領筆者進入人類學世界，也讓筆者見識其累積數十年的深厚觀察研究功力，更大膽放心地讓筆者與眾伙伴遊歷花東各地「執行」計畫，才能有此學習機會，筆者由衷感謝。

劉瑞超 序於臺大側門西雅園咖啡
2007/12/3

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

—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

目次

序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 / 夷將·拔路兒 Icyang Parod I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 謝嘉梁 III

作者序一 / 謝世忠 VI

作者序二 / 劉瑞超 X



第一章 導言 2

第二章 北臺灣阿美族都市原住民

第一節 原住民離鄉浪潮 8

第二節 阿美族遷移景況 11

第三節 北臺灣阿美族 14



第三章 阿美族豐年祭／節焦點

- 第一節 豐年祭研究概覽 20
- 第二節 豐年祭／節是什麼 26
- 第三節 「真實」的辯證 29



第四章 「傳統」的面貌

- 第一節 水璉 32
- 第二節 太巴塢 37
- 第三節 奇美 41
- 第四節 大俱來 43
- 第五節 麻荖漏 45
- 第六節 都蘭 46
- 第七節 傳統與當代 48



第五章 祭典時間與回鄉行動

- 第一節 七月的臺東 53
- 第二節 八月的花蓮 125
- 第三節 返鄉與否 177



第六章 祭典展演與都市新文化

- 第一節 秋天的北臺灣 190
- 第二節 準備與演出 215
- 第三節 娛樂休閒與文化學習 249



第七章 部落祭典與都會祭典

- 第一節 相同之處 255
- 第二節 相異之處 262
- 第三節 延續、拓展、或分立 266



第八章 文化認同與意義論述

- 第一節 原鄉部落場域 270
- 第二節 聯合豐年祭範疇 283
- 第三節 北臺灣城鎮區域 290
- 第四節 都市綜合展現 293
- 第五節 行動與意義 296



第九章 結論 300

引用書目 303

第一章

導言



一部人類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人類遷動史。移民發生在舊、新石器時代，出現於歷史時期，也正在當下時間上演故事。人類學者關注人類群體移動，一方面探索遺傳基因漂變過程，另一方面則欲知曉文化接觸所帶來之傳統文化質變與新文化創構的景況。體質／生物人類學（physical/biological anthropology）著重前項主題，社會文化人類學（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則偏重後者的研究。

當代世界資訊、商品、交通、及人群與個人的快速流動交換，造成「全球單一脈絡」（one global network）發展的現象。其中人際往來，或說人所處空間之長短期位移，對國家規制、社會面貌、以及文化價值的衝擊尤大。因此，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無不專注於該等議題，期盼作到深切理解現代世界人類活動意義的目標。

在今天的亞洲，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依臺灣、日本、韓國等邀約國之需，定期送出男性勞工至對方特定地區工作，支援重大建設。女性外勞則多充當家務工作，幫忙照顧老人、病患與小孩。這些對母國而言的外移同胞，以及對接收國來說的內增成員，是為兩邊社會變遷的主要促動要素。吾人不能不注意各項現象的發展。

除了跨國人群交換流動之外，一個國家之內，也常見不同地方居民的移出移入。在中國沿海城市有所謂內地農村遷來討工作的大量「盲流」，造成社會福利組織、醫療機構及公安部門的高度關注。另外，少數民族地區如四川涼山彝族，就曾大量移往山下如攀枝花市等城鎮，引起城鄉高度緊張關係

（張海洋 2002）。再者，內蒙古地區有一群五十年前從內地移住的漢人，因久居該地而自我認同為「內蒙古人」。「內蒙古人」與蒙古族所指不同，前者為漢籍人士的區域認同，後者則為國家認定的少數民族。這些內蒙古人對現在新進漢人移民特別敏感，常常激動地標示該特定認同，以阻擋後者的遷入（Borchigud 1996；謝世忠 2002）。

在臺灣，原住民的移民現象是為一學政雙方長期注目的議題。政府一方關心的是原住民包括居住、職業、教育、衛生等等都市生活適應問題，因此陸續在縣市政府設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或原住民行政局以為因應。另在學術一方，人類學關切文化維繫與變遷課題，社會學家提醒族群階級現象可能更為嚴重，而語言教育學者則對母語流失一事比較留心。

人類學在臺灣發展接近百年，日本學者留下了不少紀錄原住民傳統文化的資料，而殖民政府則因政治經濟考量，大規模地集團移住了不少族群部落，其中又以居較高海拔地區者為甚。人被拔離了原居地，新土地新社會關係新人口環境，必造成傳統文化與思維模式的衝擊。於是，文字化的各項「蕃族」或「高砂族」傳統資料，位居權威文本，而移住過程以及之後的變動，即成了後來接續研究之中國與臺灣籍學者的原生任務。不過，國民政府在臺以降的半個世紀間，堅持繼續尋覓「傳統」的人類學者並不在少數，因此，我們常發現，一部民族誌在論及「變遷」之時，多僅在書末寫上數語。學者們知道應該「動態性」（dynamics），也明白文化是活的，但寫出動態變遷或活生生文化卻極為不易。不過，至少大家相信「人在動，文化也在



動」。

本研究團隊由人類學專業研究者組成，因此，在探討主題上，即擬以人類學關切的文化議題為主軸。原住民十三族內部均見有同族同部落同家系成員離鄉他移，因此，每一族的情況都值得特別注意。不過，由於研究時間、人力、經費的限制，我們僅將對人口最多的阿美族進行研究，期盼以之為例，對往後其它族群類似議題的探討，能有啟發作用。

然而，問題是，研究阿美族的什麼呢？阿美歷史文化深厚，即使多位專家窮究一生，尚只能理解一隅。例如黃宜衛探索臺東海岸線宜灣部落十數年[參黃宜衛 2005a、2005b]，又阮昌銳（1969）單就大港口即寫了厚厚數百頁兩大冊基本民族誌報告書。我們團隊自然只能擇特定範疇，進行深度廣度並濟的研究。當代阿美文化最顯性者之一，即為一般所通稱的豐年祭。我們相信族人遷離部落，絕不止人走留屋空。人是文化的承載者，尤其是大量離鄉又在新地區結伴建立社區，有了族人相互理解與默契的支持，更易於新鄉重現文化，或再造傳統。阿美族人將豐年祭帶至都市一事，即如大陸東南亞泰國寮國越南柬埔寨等國人士移至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法國，同時帶去特定文化生活一般，文化移植當能直接對接收地區之廣體文化內涵，注入新要素（Smith 1994；Hsieh 2005；謝世忠 2005）。

以北美和澳洲的東南亞Hmong人（中國泛稱為苗族）為例。他們自寮國北部經泰國移至新國度，一方面繼續維繫傳統織染品文化（按，在許多大城市如美國西雅圖、洛杉磯、明尼亞波利斯，以及澳洲雪梨、墨爾本等之市

集，均可看到Hmong族人的工藝品攤位）。另一方面在陽曆十一月過年時，亦不忘大肆盛裝歌舞慶祝。Hmong人的顯形文化（expressive culture）因此成了社會新焦點，每當有類似活動，各方友親、獲知訊息者、或路過旁人，多會來參與，非常熱鬧（例如，筆者2003年參加西雅圖地區的該族過年活動，一方面看到數以百計之盛裝Hmong人，進行傳統形式之諸多儀式，另一方面其中不少人告知係全家一大早開車六小時遠處而來，也有昨天就自加拿大搭機抵達）。Hmong人據此組成會社，發展同胞情誼，也達到凝聚文化認同目標。另外，移到西方世界的泰語族系成員，總會於傳統南傳佛教的重要節日如雨安居節、佛誕日等，準備豐盛食物，群聚禮佛，族人團圓。寮人移到國外，第一件事即籌錢興建佛寺，有了佛寺，就邀來住持佛爺（筆者2003-2004在美國西北近西雅圖市之寮國移民社區田野調查，發現當地計有寮人佛寺二座，寮人佛寺二座，以及源自今中國雲南西雙版納的Lue人寺院一座。在寺內服務的佛爺和尚有的長期居美，有的則遠自緬甸、寮國來訪）。自此，一切儀式典禮均可在此舉行。人身移到外國，文化也隨之異地落實（Hsieh 2005）。

Hmong與寮人似已於西方落腳處找到新家園，那他們是否會返鄉？誠然這是一重要的研究題目。依筆者在田野地的初步觀察，自越寮共產國家離開者，多半回去意願低（他們多數仍效忠過去的國王或政體，對今社會主義政權仍具明顯敵意），從寮國移出者，則往返方便，不成問題。回鄉為探親，或為尋求文化洗禮。不過，由於移民接收國度的自由開放，使得東南亞



族籍身份的人，能安心於年節時分或寺院裏，找到文化自我，因此，移民返鄉不構成一般離鄉背井可能會出現之認同矛盾的困擾。

臺灣原住民離開部落到都市尋求新生活。臺灣島小，按理應往來方便，但都市原住民是否回鄉順利，仍是學術研究上的未知數。本書除敘述阿美族豐年祭在都市地區的再現過程，亦探討族人返鄉參加部落傳統豐年祭的情形。移民與節慶返鄉，常見當事人身體行動的文化思考。下文中，我們分析了都市情況與部落傳統豐年祭展演形式的異同，也描繪回鄉或不回鄉的選擇依據源由，另更藉此探索參與過程和文化認同維繫間的關係。以阿美族豐年祭作為典例的各項延展研究成果，應可回映上述諸多國內外族群遷移與文化存續個案，並對人類學移民研究提供啟發的素材。

第二章

北臺灣阿美族都市原住民



第一節 原住民離鄉浪潮

自國家體制進入臺灣，並施以有效統治始起（按，西班牙、荷蘭、鄭氏政權應屬半效統治，清朝後期與日本總督府方為全效統治），臺灣原住民一直是政府眼中的「問題」。清國與日治前期是「安全」問題，所以才會有各項阻擋平地山地往來措施，以及「剿蕃」、「理蕃」事務。日治後期與國民政府時期為「文化」問題，因此，「皇民化」、「山地平地化」等當代社會科學所稱的同化策略，接續上場。資本主義與民主化的當代，則是社會經濟的問題，據此，我們可以看到大量述說山地殘破的報告，以及原住民教育文化和生活水平落敗的訊息。約莫霧社事件之後，原住民不再構成力量威脅，山地安全無慮，政府開始焦慮如何以「文明」同化之（謝世忠 1987a）。在強大的同化壓力之下，原住民文化很快地面臨失去整體維繫架構的危機（例如，魯凱、排灣族貴族制度的動搖，泰雅、太魯閣兩族之gaga、gaya〔部份賽德克人稱為waya〕祖訓權威的失能，阿美、卑南母系地位的改變，以及邵族頭目威望的沒落等）。而當土地管控與開發建設成為國家施政主軸後，林務局全面進駐山地，規範原住民保留地的法律，位階次級，因此處處落居下風，山林使用權隨之流失，貨幣與無限酒類亦長驅直入，利薰麻痺族人，原住民立即陷入生存困境（參 謝世忠等 2007）。

1970年代結束之前，學政兩方各項論述多以「文化落後」的問題為基

準，檢討規劃山地社會的未來。1980年代開始，陸續有媒體、自由作家、學者、乃至原住民自身成員報導（如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出版的《原住民》、《山外山》）或研究（如玉山神學院的學生畢業論文）山地的社會經濟問題（謝世忠 1987a, 1987b）。換句話說，70年代是論述醞釀期，直至原住民生存受到威脅越來越嚴重，才有人在80年代初，於黨外雜誌中，動筆揭舉問題。各項問題中，除了原鄉經濟崩解（作物選擇失敗、土地非法租讓），人們道德淪喪（從娼人口日增）在即的警示之外，人口外流都市，部落失序徬徨亦是一大焦點。

當時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多認為「推力」與「拉力」是造成原住民外移的主因。所謂推力即指山地社會經濟條件衰退快速，留在部落無所適事，老家已不宜再固守，所以非離開不可。反之，拉力則是指想像中都市優渥的工作生活條件，吸引族人前來尋求更好的人生（蔡瑞明 1984：201f；李亦園 1982[1978]：404）。謝世忠（1987a：72）曾指出，80年代初出現了原住民情境性族群危機，其中具體的問題包括：

1. 山地經濟的嚴重不確定，
 2. 原住民人口的大量外流，
 3. 社會秩序及家庭的解組，
 4. 雛妓與童工的產生，
 5. 危險性極高之漁船船員的高原住民比率，
 6. 城鎮中之不安全行業（如礦工）的連續不幸等。
- 而事實上這些問題是從1.到6.的連鎖反應，換句話說，1.是所有問題的放射點。

基於此一觀察，謝世忠進而納入推力拉力說的討論表示（同上，頁72），

事實上這兩種力量不僅相互作用，同時，若以純經濟的角度來看，都市



提供了較佳的就業謀生機會，吸引山地原住民出來，相對地也就是反映出山地原鄉就業謀生機會的微小，這種微小的工作機會就是一種推力。

無論如何，原住民人口正以極快速度，外移都市。

各項人口歷史紀錄，都顯現了驚人的數據，1961年全國只有200名原住民住在都市，二十餘年後的1983年已有83,000人，再過十年的1994年增至113,619人。到了2005年6月則達172,307人（見楊士範 2005：17）。二年之後的統計（2007年9月）又增為191,491人（不含花蓮及臺東二縣），佔全國原住民總人口482,000人的39.72 %¹。臺北縣1956年時有1,287名原住民，扣除烏來鄉的958人，住在城區者有329人。到了1986年已有10,722位縣內都市原住民，1996與2000兩年又分別增至23,640和28,518人。臺北市截至2007年9月有12,430名原住民居民，基隆市到2007年9月則有8,079人²。高雄市方面，1961年只有57戶125名原住民，1981年有554戶 2,469人，1991年有1,168戶 4,676人，到了2007年9月則已有10,453人³。

大量的人口遷動，自然會引起廣泛注意。在此一景況下，原本積極推動山地社會「進步」的政府，似乎比較歡迎族人下山到都市學習進步，因此，並不把部落母體瓦解視為問題。不過，人一出，問題就明顯浮現。原本掛心

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網—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http://www.apc.gov.tw/chinese/docDetail/detail_TCA.jsp?docid=PA000000001316&linkRoot=4&linkParent=49&url=（2007年11月21日上網）

2 同上註。

3 同上註。

山地部落文化「落後」，因而必須加速「平地化」的政府，如今變成要憂心族人住進都會之後的住宅、飲食、衛生、醫療、職業、教育、保險、以及與城市人相處的問題了。為解決這些問題，90年代中葉過後，臺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分別成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其他縣市也設立原住民行政局，並置有原住民民意代表席次。政府原先主要的關注範圍是社會經濟生活，至於文化維繫傳承及變遷方面議題的受到重視，則是稍後數年的事。

第二節 阿美族遷移景況

阿美族是原住民各族中人口最多者。過去政府、學界、及一般社會以山地同胞、山胞、高山族、或山地人稱呼原住民時，主要居處於花東縱谷與海岸平地的阿美族顯得尤其尷尬。因為，他們多數不住「山地」（少部分山區部落有如奇美、泰源等），卻是人口最多的「山胞」族群，而其以紅色衣飾系列在觀光和多種正式（如國家節日）、非正式（如至大飯店）表演場合所跳的「山地舞」也最有名（見謝世忠 1994）。

1970、80年代臺灣開始急速工業化之際，外勞引進的觀念和條件尚未



成熟，「發展」的人力資源需求，成了農業鄉鎮人口轉業的一大選擇。阿美族不住山地，所以沒有山地保留地，一般多以「平地山胞」稱之，即使在今日，也仍將之納歸「平地原住民」範圍內。資本主義加上國家建設所引導之社會變遷力量臨至原住民地區，超過七成自日治時期中葉即已自小米改行水田定耕農業生計的阿美族首當其衝。資本主義經濟壓力配以物質利益誘人，土地生產換不了足夠養活家戶人口的金錢，水田陸續廢耕，舉債供孩子上學，老年看病、及其他各項生活維繫和特殊消費所需者眾。於是，大型工業工程與摩天大樓華庭社區都會建設，需大量勞力性工人。包括桃園和基隆在內的大臺北與高雄港市，成了族人最佳移住選擇地。許木柱等人（2001：238）認為阿美族人之所以會大量湧入都市謀生，很可能「與平地漢族早有接觸」有關。從交通方便角度來看，花東平地至臺北一線，並不比其他族須自山區下來有利，因為鐵路公路快捷性仍不足。所以，一方面阿美族人習於平地謀生環境，所以移到都市不致太陌生，另一方面該族缺乏保留地的基本生存依據保護，迫使他們不得不離開，或許也是要因之一。

相關研究指出，主要從花蓮、玉里、瑞穗、光復、富里、豐濱、鳳林、壽豐等地遷來基隆、臺北、桃園等北部都會區的阿美族人，因傳統社會組織尤其是年齡級規範的影響，致使其發揮一種「集體觀念」，到新住地後，仍群居在一起（許木柱 1987；許木柱等人 2001：238-239；黃美英 1985）。文化因素固然重要，不過，年齡級是否就是集體群聚的關鍵，仍需民族誌證據支持。至少，本研究的發現（詳見後章），臺北地區已少見年齡級，反而

是豐年節歷久不褪。

林金泡校長是阿美族知識份子中最早對都市原住民問題進行研究者。他曾指出，族人多係在都市找到好工作，再介紹父老弟兄前來參與。阿美族又因擅長捕魚，於是先參加基隆、高雄遠洋漁業，之後再陸續有人到煤礦、大樓興建、或鑄鐵板模業的工地求職（林金泡 1981）。林氏的觀察並未如許、黃等人直接思及文化的效能。「文化一定是關鍵」常是人類學者的慣性念頭，而林金泡所看到者，卻是「人之常情」的居所職業介紹引進。至於，為何群住一起？理由自然是人生地不熟，大家相鄰彼此好照顧罷了。

臺東阿美往高雄遷，而花蓮阿美則選擇大臺北基隆桃園地區，在過去超過二十年的日子裏，大致已成固定模式。由於集體遷動者多，一走，全家虛空，部落立即蕭條。不同研究者（如黃宜衛 2005a：111-112；吳豪哲 1988）分別提到了離開後，決定再返鄉居住、偶爾短暫探視或定期不定期參與節慶的景況，所獲結論不一，其中經常回鄉和很少返鄉兩極均有。此一景況與筆者團隊田野所獲訊息相符。不過，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政府體質改變甚大（按，原住民事務從僅是內政部民政司山地行政科和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山地行政科兩個低階單位，提昇至省設山胞行政局、原住民行政局、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院轄市同設原事會，以及中央成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其變化不可謂不大），國家文化政策（90年代開始以多元文化為主要價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地方政府文化中心或文化局、各級原民會或原事會、原民局等陸續舉辦各類文化維繫、傳承、推廣等之活動）與原住民權利之爭

